



刘大年与抗日战争研究^{*}

光阴荏苒,转眼间刘大年去世已经十年了。他逝后不久,遗著《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出版。这个书名准确地概括了他一生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第一,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第二,他是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前者在他的早年,后者在他的晚年:他一生八十五年的事业,以参加抗日战争始,以研究抗日战争终,这是非常难能的。

刘大年涉足抗日战争研究始于1982年。此前三十年间,他只有在早年的《美国侵华史》一书中有几处捎带提到过抗日战争,此外从来不谈这个话题。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北京史学界聚会对日本当局掩饰、歪曲对华侵略表示谴责;刘大年主持这个座谈会,讲到抗日战争,随后发表相关文章,是他“头一次写关于抗日战争的文章”。^①有了这“头一次”,继之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十多次、二十次,等等,他陆续写了大量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章(分别收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②和《抗日战争时代》两书,最后集中收入《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③下编“抗战研究”),并主持编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以下简称“《中国复兴枢纽》”)。^④这些文章的主题是历史认知,从总体上深化和丰富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而这些观点对全面认识抗日战争至关重要。给我启发最大印象最深的有三个提法。

(一)“消极抗日也还是抗日。退出抗日阵线是他(指蒋介石)的阶级利益所不许可的。他主观上希望实行抗日、反共两个第一,然而实际行动上办不到。结果他实行的还是抗日第一,反共第二”。^⑤

这是1991年他提交沈阳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的一段话。这篇论文是张海鹏代他宣读的,我在会场里谛听,当听到念这一段话时,

^{*} 这是一篇旧作,原为2010年2月2日“学者与战士——刘大年先生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上的发言稿。会后,稿子被一位同志要去复印留存,没有发表。事过多年,《刘大年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出版,看到第16卷“时人评论”里的几篇纪念性文章,又想起这件旧作,动了发表之念。事有凑巧,近日清理旧物,无意中发现1997年3月刘大年的一封亲笔信,里面讲述对抗日战争几件大事的评论等等,与此文内容多有相通,两者间正可互为补充。此信未及收录于《刘大年全集》第10、11卷“书信集”,现酌加注释,随本文公布于后(信中提到的另纸“本书编写人员”名单略),聊为弥补。

① 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题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② 刘大年:《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③ 刘大年:《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④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⑤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吓了一跳。刘大年笔下出现这样的话,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从来人们引用毛泽东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八个字都是说蒋介石不再抗日或不抗日,刘大年本人40年前也是这样说的,他在《美国侵华史》中写道:“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的。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才是中国抗日的主力,而国民党则是一贯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来更成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的严重障碍,这是铁一般的重要的历史事实。”^①现在把“消极抗日”解释为“也还是抗日”,而且是“抗日第一”,真是石破天惊。而这个提法与40年前引用这两句话时相比,其含义的变化之大更是一目了然。

(二)“抗日战争一是民族战争,二又是人民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家权力基本上掌握在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各派系手里。有蒋介石、国民党的参加,才有了全民族的抗战。否则全民族的抗战就无从实现,一时实现了也无法坚持下去。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有放弃反共,也没有放弃抗战。从全民族战争这方面看,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应当得到客观的、全面的理解”。^②

这是1995年他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所写的“总序”中的一段话(载这套“丛书”的领头书《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参加抗战”的意义和作用如此评价,在大陆可以说“前无古人”,尤其超越了他自己的过去,他在《美国侵华史》中曾经写过:“蒋介石这个大流氓,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就已经把抗日重担推卸在中国人民军队身上,实行了保存自己武装力量,向日本与美国两方面讨价还价的政策。对日本是讨论投降的时机和条件,对美国则是用‘不支持,就拆伙’的流氓手段,索取大量军火和金钱,准备用来反对人民革命力量。”^③把这段话与前引一段话比对,可以看到他这方面的认识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这里有一段小插曲。据他亲口对我说,“总序”写成后,有人对前引一段话有意见,说是“吹捧了蒋介石”。意见反映到某领导机关,这个领导机关认为确实是这样,要求他把那段话删掉。他拒绝。事情上报高一级领导机关,某领导处理此事,说刘大年的说法不错,那段话可以不删,但与此同时,“总序”应加一段话,说明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等等。他说,这很容易,就这样做了,那段原话也就保留了下来。

他为那些被认为“吹捧了蒋介石”的话受到压力,仍坚持不删改,表明他的这个新认识是非常坚定的。

(三)1996年他发表《照唯物论思考》一文,里面有“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一节,专门讨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文中提出: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发挥了领导作用,共产党也发挥了领导作用。”在两个战场的关系上,“国民党领导指挥正面战场作战,共产党领导指挥敌后战场作战”。归根结底,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上“是‘双头并存的’”。^④

这个问题他此前曾谈到过,是另一种观点。1987年他率团去日本参加“纪念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行前他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⑤文章初稿里明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一个阶段),所以是共产党领导的。大家在讨论这篇文稿时对此提出意见,认为这样的论证太简单、太牵强,没有说服力。他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在修改初稿时删掉了那些话,仍

①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60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71页。

② 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总序”,第2页。

③ 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85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68页。

④ 刘大年:《照唯物论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⑤ 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坚持共产党领导。1995年他发表《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里面有一句话“抗日战争的特异之处是蒋介石政权控制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两个战场并存”。这里说共产党他用“领导”,说“蒋介石政权”(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概念)他用了“控制”二字,显然有意地回避了“领导”,很可能还不认为“蒋介石政权”发挥了领导作用。^①一年后他在《照唯物论思考》中说了上面引录的那些话,两相比对,可以看出他在“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认识上的重大变化。

《照唯物论思考》是他非常珍视的一篇文章,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是他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所有作品中最珍惜的一篇文章。此文写出时曾送了一份给我,我读后向他提出一些意见,当谈到“关于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导中心并存”一节时,他告诉我说,文章曾请胡绳看过,胡绳在这里写了5个字:“有深意存焉”。可见胡绳对这一部分是很赞赏的。

以上举了刘大年研究抗日战争的三个提法,这些提法放回到他提出的时间去看,都是很新的,现在看来仍会感到寓意很深。这些新提法都体现出他的观点的变化。应当说,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在研究某事某物的过程中观点发生变化,是很寻常的、正常的,这往往是研究前进了、深化了的结果。由此看来,刘大年的抗日战争研究在不断深入,他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

这三个提法涉及的问题的中心是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在一些人的语言里这是三位一体)对抗战的态度及其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问题。这类问题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具有政治敏感性,很多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或不能亮明自己的观点,有些话不敢说,怕犯忌讳。这种情况对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发展是不利的。刘大年的一些新提法突入了敏感区,可说是一种示范。以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声望,这种示范对于发展抗日战争研究必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

这本书是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书末有一篇“后记”,简述全书的编写过程。^②“后记”是刘大年写的,里面有一句话:“张振鹂第二次统稿”。有和我熟识的朋友看到后问我:“这本书不是你最后完成的吗?”以为我最后统稿就是最后完成全书。这是一个误会。为了消除误会,我必须说一下实际情况。

这本书可分为两大块,前一块包括抗日战争的“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部分,后一块讲“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我统稿是统的前一块,是刘大年交我的任务;后一块是刘大年自己统稿。这就是说,全书前后两块是我和他分头统稿。实际上,前一块统稿中他也做了不少事,如,他让我改正原稿中平型关之役歼敌数的错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改正原稿中关于“消灭”朱怀冰所部的史实错误,他对“大后方经济状况与经济危机”一节原稿中的一些提法做了修改,他对统稿期间新增加的“国内人口迁徙”一节的内容做了修订补充,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撰写了好几段评论补进原稿中,等于他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部分的统稿。(顺便说一下,《中国复兴枢纽》出版后,刘大年要我写了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关于〈中国复兴枢纽〉》,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

^① 刘大年:《抗日战争的几个问题》,原发表于1995年9月11日《光明日报》第5版,后收入《我所亲历的抗日战争与研究》第330—344页。

^② “后记”署名“《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编委会”,参见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第551页。

3期,文章的第二部分原文照录了刘大年撰写的这些评论。)

统稿完工之后交刘大年,由他定稿,完成了全书。所以这本书是刘大年最后完成的。全书定稿的是他,这一点我曾三番五次要求他说明。他到最后也没有说(在“后记”里没有说),他不说明,只好由我来说。我必须说清这些情况,今天的会给了我说明的机会,很高兴,也很感谢。

附录:刘大年的一封信

振鹗同志:

司机同志取走所有的改稿和附件,我这里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收到以后来个电话。

第一部分“各党派的主张、认识”^①重新写过。它的内容是讲抗日战争历史的实质、基本特点,也是往后历史演变的张本。必须有此一节,才便于把全书结构撑起来。也就是说,它近乎全书头脑,否则就显得没头没脑。上面史实较少,评语较多,这也是不得已的。自此以下,本书大约有十来处较重要的评论,包括汪伪政权、皖南事变、大后方民主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雅尔塔协定等等,其中有些是涉及抗日战争全局的,希望它们对读者有点帮助。前代日本学者田口卯吉说,“历史者,古来之评也”。那是有道理、有见解的。其实中国古来的传统也是如此。现有这些评论,当然并不一定妥贴,也许还有需要评而没有评的,可以由读者去批评,也请研究者讨论。

以下有几件具体的事:

(一)“副主编张振鹗”照工作先后顺序排在何、罗^②后面,不要遗漏。(二)“本书编写人员”见另纸,名单是抗战馆^③提供的,应照抄不误,不过那字迹实在太难认了。“刘大年阅读一遍”,只能这样写,不可改动。写上也只是表示负责之意而已。文化节^④是在《枢纽》印本^⑤上改的。个别地方勾画不清,可复印剪贴。闻稿^⑥从头改过,末尾某行特地加了几个字,不要去掉。(四)^⑦“引言”^⑧用《时代》^⑨上《理论与事实》全文,删去此题,写上《引言》,附去《时代》一册。不知还有什么遗留的问题,电话上再说。

敬礼

刘大年三月十二日晨

[作者张振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各党派的主张、认识”,指《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书中之一(三)“各党派对于夺取抗战胜利的不同认识”。

② 何、罗:何理、罗焕章。

③ 抗战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④ 文化节:《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最后一部分(节)“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化”。

⑤ 《枢纽》印本:《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1995年7月印制,只印了几十本供作者继续修订用,并分送一些同志提意见,未公开发行。

⑥ 闻稿:闻黎明的改写稿。

⑦ 原信无“(三)”。

⑧ 引言:《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引言”。

⑨ 《时代》:刘大年著《抗日战争时代》。



Chengdu. However, the careless omissions and mistake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isposal reflect the problems in its ruling logic and ability to deal with emergencies.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and the Internal Disputes in Japan in 1941 Zhang Zhan(68)

After recognizing the Wang Jingwei puppe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e war consumptions, decided to give priority to obtaining war resourc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This policy brought great practical pressure to the Wang puppet government. Wang Jingwei was eager to visit Japan and requir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o adjust its policy towards Wang, but it was repeatedly rejected by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The main cause of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in 1941 was that Japanes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organs in China reached a consensus out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jointly pressed the Japa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process also shows the complexity of internal interests competitions in Japan.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decided to give Wang high-standard treatment, but did not make substantive adjustments to its policy. Wang Jingwei's visit to Japan eventually evolved from a political event expected by him into an ordinary ceremonial visit, which was also the result of a balance of disputes within Japan.

The Sino-British Negotiations around the Detention by the British-Myanmar authorities to the Foreign Loan Materials for China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uo Shuangwen, Ye Xin(81)

The Distribution, Reception and Use of Japan's Compensation Materials shipped to Shanghai after the World War II, 1947 – 1958 Xu Kun(99)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Compensation Commission of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cept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in advance and to bear the costs of transportation, storage, unloading and reloading. Facing multiple restrictions on funds, capacities and technologies, the Commission, with the help of concerned Ministries and Committees, reluctantly shipped all the first and second batches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o Shanghai Port. However, after being handed over to the concerned units, they were unable to be repaired, reloaded and used. In 1949, when the Kuomintang's defeat was inevitable, it began to demolish and transfer compensation materials and even destroy materials that could not be transported away. With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 the new established government began to take over the deployment, reloading and use of Japanese compensation material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de overall plans and effectively used these materials to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xtil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uring the three-year economic recovery period, and to strengthen the iron and steel smelting an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period.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in Japan Qi Jianmin(114)

Liu Danian and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Zhang Zhenkun(134)

A Work of Ultimate Rescue and Standardization—Comment on *The Memory of War: The Oral History of 100 Veteran Soldie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Li Jifeng(138)

Re-exploring the Truth through *Truth* Zhang Jingwei(142)

A New Explor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Regional Perspective—A Summary of the Second Symposium on Regional Research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Resistance in Hunan Luo Yunsheng(144)

A Summary of the Seminar on the Study of the Resistance History in South China Li Hao(149)

A Summary of the Sixth Young Scholars' Conference o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Siji(153)